

美妆帝国

蝴蝶牌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
IN CHINA

LOCAL INNOVATION AND TRANS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MAKING OF A COSMETICS EMPIRE,
1900 — 1940

[美]林郁沁 著 陶磊 译

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

蝴蝶牌

BUTTERFLY

中文版序

本书能翻译成中文，我深感荣幸。书中的主人公陈蝶仙有诸多身份，其中之一便是翻译家。他翻译过侦探小说，比如福尔摩斯，还有各种法律条款以及制造化妆品的配方。他采用的翻译方法是对文本进行改编以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同时将故事或翻译过来的知识用令人信服又浅显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国内读者。这种改编文本的方法也被他拿来改造外国化妆品的生产配方和生产技术。正如我在书中描述的，正是这种改造行为展现出陈蝶仙令人惊叹的聪明才智。

本书的译者陶磊先生在翻译这部专著时展现出了与之相仿的聪明才智。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而他完成得很出色。翻译这本书所需的智慧还得从书名说起：标题里的关键术语“vernacular industrialism”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本书中至关重要。然而作为新名词，它一开始就给翻译带来了挑战。要把“vernacular industrialism”翻译成中文，并无捷径可循，因为中文里根本没有相应的术语可以传达这个英文术语的多重内涵。当然，“vernacular”的字面意思就是“白话”，但把“vernacular industrialism”译成“白话工业主义”明显毫无意义。

在英语中，“vernacular”首先是一个语言学学术语，指的是非普世的、带有本土特色的语言或方言，它们不具备官方语言或古典文学语言那种鲜明的文化权威和正统性。“Vernacular languages”对所有人通用，无论平头百姓还是社会精英，但其中包含的通俗性显而易见。语言学层面的含义是最初促使我选择“vernacular”的重要原因。陈蝶仙是上海商业出版市场的领军人物，他用文言创作的小说在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群中流传甚广——欣欣然沉醉于这些言情小说的读者也正是他推销各种化妆品的对象。请注意，这些作品绝对不是用“五四”知识分子提倡的高级“白话”写成的。但就接受度和读者群而言，陈蝶仙的作品更适合普通人阅读，恐怕比“五四”时期诞生的白话更加“白话”。尽管“五四”知识分子推崇白话文，但他们的读者主要是小众精英。相比之下，陈蝶仙兴许拥有多得多的大众读者。

除了语言学的含义，我之所以被“vernacular”吸引还因为这个词包含了多重隐喻。虽然“vernacular”最初是指地方性语言和方言，但业已在其他领域用来描述更广义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是本土的、局部的、更底层的，故而每每与普世性或典范性相对。以建筑学领域为

例，“vernacular architecture”指的是本土化或地域特色的构造，使用该建筑所在地区的传统原材料建成。和这种本土化或地域特色的构造方式形成对比的，是高端的现代主义、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构造方式，后者作为普世性的建筑形式，已被奉为真文明的标志。正是通过上述方式，该术语往往作为一种手段，反复强调自给自足的特征，同时也可以用来质疑所谓经典建筑风格的优越性。

正如我在本书导论中所说，科学史家和技术史家也用“vernacular”来描述本土的、局地的、都市之外的科学活动和工业活动，它们在正规的现代科学和工业体制之外，多见于殖民地或非西方地区。学者们将该术语用于非西方以及现代早期乃至前现代，通常也是为了对现代科学相关的普世化主张进行去中心化。我的研究借鉴了这一史学传统，强调陈蝶仙以及和他类似的中国人如何以非正规的、临时的甚至盗版的方式，来获取资源、复制技术以及建设工业。这种活动之所以属于“vernacular”，乃是因为它们不依循正规的工业化路径，而是一切从零开始。这便使得像陈蝶仙一样处于不利位置的人在全球商贸中站稳了脚跟。在意图保护自身市场优势的人看来，上述做法常常被斥为“剽窃”。而且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法律领域和发展中的全球商标体系中，这种行为每每被直接贴上“非法”的标签并加以禁止。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意在囊括以上含义，亦即陈蝶仙所展现出的特征：他不得不随机应变，利用本地原料，让外国技术适应当地环境，施展浑身解数白手起家。可以肯定，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陈蝶仙的工业活动在某些方面是本土化的，甚至是“本土主义”(nativist)的。因此，“vernacular industrialism”翻成中文可以是“本土工业主义”。但“本土”一词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虽然陈蝶仙自称本土主义工业家，但他很擅长从全球流通的思想和材料中汲取资源。实际上，本书的一个关键论点就是：中国的工业活动从来不只是本土化的，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本土”也无法传达陈氏工业主义中的临时性、“草根”性以及DIY特征。

我们最后决定把“vernacular”译为“民间”。应该说，“民间”更接近英语中的“grassroots”（草根）。而且和“本土”一样，它没有“vernacular”的语言学内涵。尽管如此，“民间”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民间”一词略带本土主义色彩，但其核心含义主要是属于民众、在民众之中，或白手起家。更重要的是，这个词还能暗示“本土”无法触及的陈氏工业主义的其他层面，包括其工业活动因地制宜的特征。因此，最终确定的翻译

是“民间工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可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吸引他们阅读此书，从而了解与该短语相关的那些丰富而复杂的意涵。

翻译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事物无法从一种语言完美地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产生的“裂隙”，正是陈蝶仙本人在20世纪早期输入外国技术、把知识和思想翻译到中国来时努力解决的问题。而调适和翻译的过程恰恰提供了修补的空间，让他能够巧妙地迎合本土需求，打破本土局限。这些“裂隙”本身就是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因此，我希望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翻译“vernacular industrialism”所产生的“裂隙”也具有类似的创造性。希望中美两国学术界的沟通和交流能一直持续下去。事实上，保持这样的对话始终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如今的世界。

林郁沁

2023年4月11日

致谢

为了理解陈蝶仙这样一个睿智又充满复杂性的人物，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团结协作的旅程。这些年来，朋友、同事、学生以及研讨会上的听众，共同参与到这一课题中来。有些人深入阅读了某一章（或几章）、某一份原始资料，探讨了某个问题，或只是随意评论，却给予我极大的启发。有些人慷慨分享了尚在进行中的课题，或是邀请我参加工作坊，让我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推进。还有一些人，对本书的标题作了反复斟酌，或辨析其核心概念。我要感谢安大年(Dan Asen)、包卫红、边和、金·勃兰特(Kim Brandt)、蔡丹妮、米娅·卡特(Mia Carter)、陈怡君(Janet Chen)、祝平一、黛比·库恩(Debbie Coen)、罗伯·卡尔普(Rob Culp)、威尔·德林杰(Will Deringer)、戴沙迪(Alex Des Forges)、艾尔曼(Ben Elman)、马尔瓦·埃尔沙卡拉(Marwa Elshakry)、艾约博(Jacob Eyferth)、范发迪(Fa-ti Fan)、李峰、葛凯(Karl Gerth)、韩墨松(Peter Hamilton)、韩嵩(Marta Hansen)、韩嵩文(Michael Hill)、艾缇捷(T. J. Hinrichs)、姬晓茜、季家珍(Joan Judge)、古柏(Paize Keulemans)、高彦颐(Dorothy Ko)、韩莉(Liza Lawrence)、雷祥麟、梁韵婷(Elaine Leong)、西尔维娅·林特纳(Sylvia Lindtner)、卢苇菁、吕妙芬、孟悦、普罗吉特·穆赫(Projit Mukherji)、张倩雯(Rebecca Nedostup)、钱颖、雷勤风(Christopher Rea)、芮哲非(Christopher Reed)、卢卡斯·里佩尔(Lukas Rieppel)、许腾睿(Tristan Revells)、阮思德(Bruce Rusk)、石熬睿(Ori Sela)、萧建业(Victor Seow)、卡维塔·西瓦拉马克里希南(Kavita Sivaramakrishnan)、沈德容(Grace Shen)、约翰·特雷施(John Tresch)、石静远(Jing Tsu)、约瑟夫·乌里奇尼(Joseph Ulichny)、魏简(Sebastian Veg)、傅朗(Nicolai Volland)、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吴逸仙、格兰特·威索夫(Grant Wythoff)、曾小萍(Matti Zelin)、张颖和张仲民。

毫无疑问，这个名单里还应该包括更多人。我在一些工作坊、研讨会和演讲中报告过本课题的部分内容，讨论者和参与者们都应该囊括进来。我去做过相关交流的美国大学有：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化学遗产基金会(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

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康纳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以及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国外的有中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台湾大学、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y)、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新加坡国立大学、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我还在一些组织举办的研讨会上参与了分组讨论，这些组织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学会亚洲年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 Asia)、“亚洲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及“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参加这些研讨会促使我精益求精，打开思路，同时更负责地运用史料、组织论证。

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很多研究生，他们在课上阅读并点评了本课题的草稿。他们的观点和意见总是礼貌又温和，但对这份成果的影响远超想象。更幸运的是，我还有不辞辛劳又卓有天赋的研究助理。这方面特别要感谢崔高子彦（音）、何映天和胡艺泽。最近加入的黄彦杰帮我妥善处理了一些细节，我也很感激他。

我还通过种种渠道得到了诸多支持，获益匪浅。我主持的研究项目曾获得以下资助：“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查尔斯·赖斯坎普奖助金”(Charles A. Ryskamp Research Fellowship)一项，中国台湾地区外事部门的“台湾奖助金”(Taiwan Fellowship)两项，以及国内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基金和公休假期。“蒋经国研究奖助金”(Chiang Ching-kuo Research Fellowship)、“国家人文基金会奖助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Fellowship)，还有“历史研究院进修学者”(Advanced Studies,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Membership) (“斯塔尔东亚研究基金会” [Starr Foundation East Asian Studies] 资助) 的身份给予我宝贵的时间。有了这些慷慨的支持，我才得以从教学和行政事务中抽身出来完成本书的写作。

克莉丝蒂娜·邓巴(Christine Dunbar)、克里斯琴·温廷(Christian Winting)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的其他工作人员对我耐心有加，他们熟练地完成了整个出版流程。范发迪、舒喜乐

(Sigrid Schmalzer)以及出版界的另一位评论家，提出了尖锐而切中肯綮的批评，并就如何精炼书稿、加强比较和推进概念前沿给出了很好的建议。一如既往，所有的错误和不足由我承担。

第二章里的材料最初在《奥西里斯》(*Osiris*)杂志第30卷第1期(2015秋)特刊《科学里的男性气质 / 男性气质科学》(“*Masculinities in Science/Sciences of Masculinity*”)第134—157页发表的《给男人的配方：化妆品制造与20世纪10年代中国的生产政治》(“*Recipes for Men: Manufacturing Make-up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in 1910s China*”)里探讨过。第一章和第五章中的一部分，摘自《蝴蝶标志：陈蝶仙及其品牌与中华民国的创业精神》(“*The Butterfly Mark: Chen Diexian, His Brand, and Cultural Entrepreneurism in Republican China*”), 收录于雷勤风、傅朗(Nicolai Volland)主编的《文化生意：中国和东南亚的文人创业者(1900—1965)》(*The Business of Culture: 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 — 65*)(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5)。第四章有一节里，部分初稿早先在《奥西里斯》(*Osiris*)杂志第33卷第1期(2018)第271—293页(© 2018 by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发表的《中国仿制者的生产活动：20世纪早期的全球科学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商标与配方》(“*The Making of a Chinese Copycat: Trademarks and Recip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Global Science and Capitalism*”)中探讨过。最后，第六章里有两节见于《校正科学：20世纪30年代一名工业家的编辑、实验手册》(“*Proofreading Science: Editing and Experimentation in Manuals by a 1930s’ Industrialist*”), 载《中华民国的科学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publican China*),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石静远主编(Leiden: Brill 2014)。

我的女儿林韵之令我和丈夫的生活多姿多彩。她出生于2007年，恰逢我出版第一本书。她的到来让我的家庭臻于完美，还带来了难以言表的欢乐和满足。虽然在工作 and 家庭之间保持平衡并不容易，但我无怨无悔，而且所获尤多，因为我做到了——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漂亮的女儿林韵之，还有我的人生伴侣古柏。

导论

家庭工业社的创办人陈栩园先生，字蝶仙，……不但是琴棋书画、丝竹吹弹以及三教九流，无所不能；就是对于近代的各种科学，也是非常有研究的。所以他的文章，范围很广：能写小说，能写诗词，能写政治经济，也能写物理化学。而且不仅是“知”，还能实地去“行”。家庭工业社各种出品，大都是他个人亲手实验的成绩。……像他这样的人，我们纵然不敢称他是中国的爱迪生，然而说他是一位现社会少有的奇人，大概不能说是过分的恭维罢。

——“家庭工业社”(1935)

这段偶像化的描述说的是陈蝶仙(1879—1940)——一个博学多识的文人、工业家和科学工作者。引文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之所以出名，不仅是由于他的才华和学识，更因为他具有从事文学创作到科学实践和工业建设等一系列工作的能力。他受到的褒扬，既包括学识渊博，还包括能将知识付诸实践。他著述丰富，又投身科学实验，还创办了公司。这位评论者虽然认为陈蝶仙大概还算不上中国的爱迪生，但仍将其誉为现代“奇人”。

乍看之下，陈蝶仙的生平似乎很符合上述特征。清朝末年，陈蝶仙还是杭州的一个年轻人，他把自己的书斋改造成了化学实验室，一边打磨文学技巧，创作关于新技术的诗歌，一边埋头于化学实验。1913年后，他成为上海的一名职业作家和编辑，靠连载言情小说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和文学声望。与此同时，他还搜集、编辑资料，在报纸期刊上开设了具有影响力的“常识”栏目，主要刊登工业和制造方面的大量信息。以创业者身份崭露头角的陈蝶仙，把乌贼骨磨成粉，为粉剂化妆品制备本地原料。1918年，他创办了“家庭工业社股份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家庭工业社”），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最成功的大型药企之一。这家公司最著名的产品——“蝴蝶牌”牙粉，和它的发明者一样万能，还可以用来擦脸，其功效在众多牙粉中独树一帜。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款产品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赶超了日本及西方品牌。在一个“词”与“物”不但可以批量生产也可以批量伪造的时代，陈蝶仙积极捍卫自己的本土品牌，始终推动关于商标侵权的新兴国际法，即便他同时为了支持国产商品而鼓励“仿制 / 仿造”(emulation)国外技术。

如果说这段偶像化的描述和陈蝶仙的真实生平确有相合之处，本书也无意于歌颂一个以某种方式超越了时代的特殊人物。本书同样不打算将陈蝶仙和那些与众不同的伟大发明家作类比——就像题记那样略带遗憾地指出陈蝶仙还不能算是中国的爱迪生。确切地说，本书乃是利用陈蝶仙在工业、商业以及文学方面的事迹，在更大范围内考察一批具有商业头脑的文人精英如何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投身工业建设，从事科研与贸易。像陈蝶仙这样的人，在清王朝衰败的过渡时期筚路蓝缕，他们凭借自己接受的传统教育，试图在刚刚开始商业化的文坛和新兴的工业制造领域获得成功。中国在经济上被境内的帝国主义卷入世界贸易体系，陈蝶仙孜孜不倦的努力构成了一种我称之为“民间工业主义”的形式。这种工业主义是本地的、“土生土长”的（与帝国主义的或国外的相对），属于非官方的、中国消费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国家发起的，或学院内的），在观念上则是工匠式的、家族经营的，即便最终落实于工厂。其中包含等量的物质性工作——生产原料及制造配件——和知识性工作，比如在杂志、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上编纂技术指南类的专栏，介绍制造知识。陈蝶仙在民间工业主义方面所做的尝试，有些并没有起到工业上的效果，甚至显得“无关紧要”（包括在杭州诗坛展现其文学智慧，在上海打造关于新式审美和生活态度的市场）。其余则刚好落入所谓工业现代性的范围，催生了中国制药工业。这种民间工业主义，更进一步说，最终超越一切个体努力，凭借民族精神汇入了当时的“国货运动”——一场“买国货，造国货”的运动。不过，民间工业主义在推广时虽然号称是本地的、国产的，但往往还是要融入法律、科学和贸易的全球流通才能维系。

类似陈蝶仙这样的民间工业主义者，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特征的有力反证——后者只对书本知识和儒家经典感兴趣，关心的都是些琐琐碎碎、异想天开的活动。当时的知识分子常常表现出对商业和逐利的蔑视，他们疲于应对——也没有准备好应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不愿或无力亲身实践以及接受科学技术。20世纪早期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知识分子，批评“旧文人”是不可救药的鉴赏家，就算对机械或技术感兴趣，也只是当作奇珍异宝、空中楼阁。照他们的说法，这些人没有能力适应包括科学在内的新式知识，无法满足现代世界的要求。本书通过聚焦陈蝶仙，从根本上质疑这种说法，阐明他和与之类似的人们在现代出版文化乃至工业、科学和资本主义等中国新兴领域扮演的角色。

假如说陈蝶仙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自己获得的成就，但他的事业毕竟代表了他所处的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特征。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国

引人注目的变局。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造成的破坏，深深撼动了清王朝。1905年，科举考试体系——长期以来将中国知识精英与官僚政治捆绑起来的制度性机制土崩瓦解。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儒家经典的官方特权及其道德化的书面知识陡然消解。1911年，帝国灭亡，新兴共和政体(1912—1949)的头十年始于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旋即四分五裂，陷入政治的无序状态。1911年的革命目标——包括订立合适的宪法以及建立议会政府——终成镜花水月。到20世纪10年代末，内战席卷中国，中央政府失势。混乱的政治给帝国主义者壮了胆，尤其是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渗透，向这个蹒跚起步的弱势民族提出羞辱性的要求。瘫痪的北洋军阀中央政府以及无处不在的派系争斗和贪腐，让很多人远离国内政治。

然而，即便呈现出这样一副衰败、混乱和不稳定的景象，20世纪早期还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机遇。虽然题记提到的爱迪生更多的是夸张的修辞，是评论者塑造偶像的一个环节，但也确实指出了托马斯·爱迪生和陈蝶仙从属于怎样一种全球趋势：创业型人才可以利用社会上的新机遇，体验不断加速的工业发展。在中国，失去权力、无所归依的文人，离开了垂死的北方政治中心和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学术中心，在生机勃勃的通商口岸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Reed 2004; Meng 2006)。他们迁居到这些新的中心，借助文化技能，在迅猛发展的营利性出版行业、新兴的娱乐文化界，乃至商业化的轻型制造业中开拓新途径。借助知识生产机构、社会职业以及动荡的政治权力结构，城市行动派们施展各种创业策略以应对变化。地方精英、城市里的鉴赏家（或男或女）、特立独行的创业者和工业家、业余的科学家、中医世家、职业编辑以及审美“专家”——所有人都在利用新机会。这种转变不仅限于中国。例如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朝鲜，一些自学成才的发明家便成功地向“东京帝国专利局”(Imperial Patent Office)申请到了专利，尽管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科学技术教育或机构支持。

20世纪到来之际，世界范围内涌现出一批引领工业现代化转型的新式创业者，陈蝶仙堪为表率。其行事泰然自若，所作所为每每不落窠臼，以本土化的方式建设工业，涉足科学活动，开发商企，既包括语言文字层面也包括物质层面。他翻译化学、法律方面的文献，探索相关知识体系，改造外来技术，并公然追逐利益——中华帝国晚期，此类活动在正派人士看来是不可想象的。通过高效地制造并出售“词”与“物”，陈蝶仙得以彻底重塑和更新了文人形象。最后值得强调的是：陈蝶仙的事业既是文化的也是商业的，既是想象的也是付诸工业化的，既是文字的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美妆帝国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国民间工业史》林郁沁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86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